

N 本期聚焦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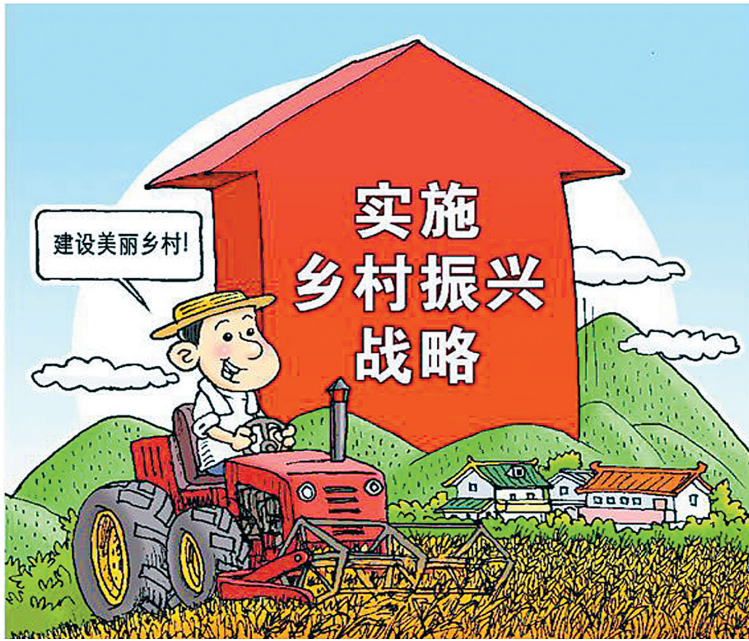
我看乡村振兴战略

王东京

“乡村振兴战略”以前不提而为何现在可以提？我的解释，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农村劳动力流向已开始发生改变。何以作此判断？请注意2008年这个节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年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而据有关调研报告称，这2000万人后来大多留在农村就业创业，并没有再进城市。事实上，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频频出现招工难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说自己的观察。不久前我去贵州六盘水调研，看到有不少企业家到乡村投资。这些企业家之前其实也是农民，进城打工到技术后自己办了企业。不解的是，他们为何不留在城市而要回到乡村投资？我分别访问过其中几位，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皆说现在投资工业已不如投资农业赚钱。这回答我相信是真话。随着工业投资密度不断加大，利润率肯定会下降。经济学所谓“投资收益递减规律”，说的就是这道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企业家到农村办企业会增加当地农民收入。从选择角度看，这无疑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比如过去农民种地年收入为5000元，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就是5000元。假定当地农民年收入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增加到20000元，则机会成本就上升到20000元。再有，进城务工不仅背井离乡，而且生活费用也高，假定一年房租和孩子寄读费是20000元，这样务工收入若达不到40000元，进城务工就不得不偿失。今天劳动力流动出现“刘易斯拐点”，原因即在于此。

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我看到的资料，20世纪50

年代美国就出现了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到70年代，欧洲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也相继出现这种趋势。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6%，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势而为，适逢其时。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举措：即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或许有人说，以上举措在以前的中央文件中皆能找到，新话并不多。可我要提点的是，十九大提出的举措与之前的举措虽相同，但含义却不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对农民讲，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而中央今天重申，一方面是对农民讲，同时也是对城市的企业家讲，目的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农业，大胆吸收农民承包地入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据此分析，我们便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意。从近期看，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决胜全面小康当然需要振兴乡村。从长远看，则是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后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后果会不堪设想。（有删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来源：学习时报

城乡融合是带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毕夫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不仅第一次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时间表，而且在首次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中，将“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置于“七条道路”之首。城乡融合发展强调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联动，一方面运用城市资源要素、产业辐射等能量带动农村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公共与社会资源优先向农村投入与聚集；一方面要对标城市，补充农村短板；一方面要在诸如宜居质量、环境改良等部位超越城市，形成乡村新的吸引力。城乡融合就是要彻底打破传统的二元结构，就是要形成乡村

与城市竞相繁荣兴旺的格局。未来的农业不仅可供我们食物，也会给我们提供田园景观、农家乐趣、稼穡教育以及各种创意产品；未来的农村不仅是农产品生产地，还承载着维护自然肌理的生态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未来的乡村不仅是农民的聚居之地，也是城市市民休闲与常住的理想场所。

城乡融合的核心是要素融合，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土地资源再配置而形成的融合。基本路径是，立足于土地“三权”（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置，农民将土地经营权让渡给城市工商企业，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工场与农业工人，前者通过农业规模化与集约化经营获取利润，后者通过土地入股

获得分红，二者由此生成非常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农业工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品种与技术改良，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得以做优做强。

城乡融合并不是乡村振兴的应急之策，而是一项长远之举。为此，必须将城市公共资源的投资建设与治理方式引入农村。

一方面，要通过国家财政投入全面而深度地整治农业面污染、工业“三废”污染以及人畜生活污染，加快补齐目前4万多个乡镇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几乎空白的“短板”，由此可以采取财政补贴、资源价格折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经营。

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除了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自来水、下水道、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重点是健全与强化农村医疗救助与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力争形成一村（行政村）一医院、一镇一养老院的供给格局，同时实现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保障资源的城乡联网。

也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都市人群向农村流动与居住，也才能吸引更多的返乡人员回归乡村创业兴家，商业要素与产业资本也能获得永久留在农村的生活土壤。

（作者为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来源：中国青年报

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内涵是啥

王丽丽

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重要基础。传统文化的碎片化、地域过度疏化、地方空心化等已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一些农民对乡村日积月累的情感已逐渐淡薄，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出现了衰微的迹象。有些农村文化生活的“主体”成员虽然常

年背井离乡，但这反而唤起了他们的“乡愁”，激发了他们参与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各种乡村仪式活动的热情。为此，乡村文化的建构，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以广大农民为主体，以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为核心，最终形成农村文化“管理以县为主、协调服务以乡为主、建设以村为主”的新

格局。实现乡村振兴，从客观上说，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工程；而从主观上讲，则是一个重建社会信任的工程。因此，要通过教育与疏导、文化自觉、村民自治等方面来重塑乡村道德。一是各级党组织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文化振兴发展规划；二是需对各类文化组织进行整合，实现城乡

联动、上下呼应、文农结合；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培养一批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村的文化骨干；四是要培养农民积极主动的公共参与意识，引导他们文明理性的参与行为，重塑乡村社会关系，共同致力于乡村的善治之道。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N 有此一说

高德步

中国的人文传统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即人文之“人”的方面；二是“人文化成，文以载道”，即人文之“文”的方面。就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而言，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民族文化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

中国文化传统讲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这里指的是人文之“人”，是本体意义上的，强调人的本质、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本质、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人文视域之下，中国经济学应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中国经济学应是“人”的经济学。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

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

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观，“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物本”的主导性压制了“人本”的主导性，致使人们“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倒置之民”。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位置，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从物的经济学转变为人的经济学。而对于国家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即“以民为本”。无论“人本”还是“民本”，其具体体现都是民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就是在人本观基础上，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传统，确立“以民为本”的政策方向，建立“以人为本”的“人”的经济学和“以民为本”的“民生”经济学。

其次，中国经济学应是

“善”的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提升为以“仁”为本的价值高度，从而确立了“仁”为本的伦理本位。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是要恢复经济学的伦理性质，主张从“人性”出发建立“仁性”秩序，用“价值”来矫正和规范“理性”，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所以，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人的理性，还要研究人的感性，更要研究人的“仁性”；不仅要研究人的“利己”行为，还要研究和鼓励人的“利他”行为。这样，竞争作为经济学的天然原则也要有所改变，即从强调竞争效率转变为强调合作效率，建立“合作为体，竞争为用”的市场经济原则，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最后，中国经济学应是“美”的经济学。在人的理性和感

性之间，以“仁”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感性，具有浓重的“诗性”特点。西方经济学建立在片面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忽视了人的感性方面，进入“理性人—经济人—经济动物”的误区。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就必须重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将经济学建立在“现实的”人性基础上。而现实的人，不仅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因而才是活生生的；不仅有血有肉，有物质需要，而且充满激情，充满仁爱之心，同时有精神追求和文化需要。所以，实现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除了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美”。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来源：光明日报

N 学者观察

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人

程虹

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方式，使得无论是企业家群体，还是政府官员群体，以及包括高技术人才在内的劳动力群体，他们都更加熟悉高速度的技能，而对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还缺乏相应的能力储备。因而，2018年最为关键的，就是要让以上三类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人群，开始学习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知识，并真正掌握相应的能力，这样才能使高质量发展开好局。那么，他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升各自的高质量发展能力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对企业家而言，最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能力，就是掌握用创新推进企业发展的方法。也就是说，企业家要真正地转变发展方式，以独创性的产品和服务创造需求，实现企业基于自身核心能力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学会管理创新，真正将人力资本当作企业发展最大的红利；为高技能人才提供具有激励的制度环境，大规模投资员工的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将企业投入的重点转向技术创新领域，建立专业的研发部门，提高研发投入的强度，形成知识产权的价值最大化。对于企业家而言，要真正掌握以上能力，就必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方法，依靠智慧和数据分析来进行决策。可以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最大的约束条件就是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升级。只有牢牢掌握企业家这一关键群体，才能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对政府官员而言，最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能力，就是掌握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法。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更需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大规模投资来驱动发展。因而，通过改革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了政府官员最主要的任务。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发展理念，加快形

成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而不是一味地靠投资拉动；要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转向人力资本投入，大规模地增加教育、健康和文化的财政支出比例，用软投入的增加推动新动能的形成。因此，政府官员的高质量发展能力，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地尊重市场和敬畏市场，要让制度来激活市场主体的活力，让制度来约束市场的风险，加快形成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特别要加大要素市场改革的力度，以更好的市场竞争政策和环境来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

对劳动力而言，最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能力，就是掌握不断提高技能的创造性学习方法。我国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从依赖劳动力红利的发展模式，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的发展模式。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劳动者学习能力的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要实现创新驱动，而创新完全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主要取决于人的学习能力。实际上，劳动力学习能力的重大来源就是“干中学”，也就是通过团队的合作与知识交流来推动技能的提升，特别是掌握更多的隐性知识。随着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普及应用，尤其是“机器换人”速度的加快，劳动力群体应进一步加大对新技能学习的投资，而专业技术人员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也同样需要通过终身学习来实现技能的创新提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2018年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元年，最关键的就是要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这一基础实际上就是，人的高质量发展能力的学习和形成。我们相信，有了这一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就一定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观点集粹

弘扬传统文化需确立大历史观

姜义华在《北京日报》刊文指出，怎样才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传统文化？首先要确立一种大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这就是必须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这三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将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种大历史观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给人们增加一些知识、一些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自

己所处的世界从哪里来，清醒地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清醒地认识自己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只有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一统中，在中国自身、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统一中，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全部历史联系的真正意义，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训，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自

为什么坚信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人

郝铁川在《解放日报》刊文指出，为什么有学者夸大人工智能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因为看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不一样。我们允许在学术研究中百花齐放，但讨论类似问题还是需要寻找最大共识，要坚守唯物史观两个基本的观点：第一，什么是人？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的工具、人的器官延伸，因而没法在法律关系主体中真正成为一个主体。第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在这三个要素中，劳动

者处于支配地位，而人工智能属于劳动工具，为人所造、为人所用。现在，似曾相识燕归来，克隆人走了，人工智能来了。法律界对人工智能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态度。一是可能这个问题可以随便扯，怎么说都无大碍；二是这个问题又跟现实没有直接关系，不会动了谁的奶酪。很多看法都是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因而没法在法律关系主体中真正成为一个主体。第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在这三个要素中，劳动

使生产力得以提升的不是分工是市场

朱海就在《深圳特区报》刊文指出，“发现市场的知识”是产生分工的前提，但市场范围只是为“发现市场”提供了条件，并不自动地导致分工的产生。也就是说，“市场范围”并不意味着产生出“发现市场的知识”。值得担心的不是失业问题，而是企业家有没有创新的问题。假如企业家有创新，工人的技能可以被用于新的生产部门，成为新的分工中

的一部分。比如生产传统手机的工人，可以转移到智能手机的生产线上，他们也会获得新的技能。分工并不总是提高生产力，比如在前苏联也有分工，朝鲜也有分工，这些分工要是没有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本身都是难以维持的。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产生的分工才能提升生产力，也就是说，使得生产力得以提升的不是分工，而是市场。